

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修纂考述*

——以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对勘为中心

樊 宁

内容摘要: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阮校记在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成果等方面,存在大量因袭卢校本的情况,尤其是阮校记的诸多校语存在谬误,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明晰致误缘由,此为证实阮校记承袭卢校本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阮校记在校勘方面又有所增补推进,如补入新的版本异文,增加参考著作的数量,使用叶钞本《周易释文》校勘文字,对部分条目进行考辨与按断。卢校本不仅在校勘步骤、方法上给予阮校记很多参考便利,还提供了基本的工作思路;而阮校记在卢校本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与批判,从而推陈出众多发明创造,终成典要之作。

关键词:卢文弨 《周易注疏》校本 《周易注疏校勘记》 修纂

清朝嘉庆年间,阮元主持修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汇集众本,精审严校,堪称群经校勘集大成之作,享誉学界两百余年,嘉惠学子,不计其数,赞美之声,不绝如缕,至今依然。关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缘起、参与人员、成书过程、校勘体例、所据版本、引用文献等诸多方面,学界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①。然存留至今的问题亦有不少,仍有进一步探讨的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研究”(17ZDA259)、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卢文弨《周易注疏》批校本整理与研究”(2030)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其重要者,如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1963年第3辑,第25-60页;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日〕水上雅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以及段玉裁的参与》,《中国经学》2010年第6辑,第143-162页;杜泽逊:《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文献》2014年第2期,第3-9页;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国学研究》2015年第35卷,第1-17页。

空间。其中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莫过于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本对《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修纂产生了哪些影响?二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对于此问题,学者们讨论甚多,颇具争议,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卢氏启发说”,认为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本对阮元编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启发与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甚至可以称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蓝本。此说首创自清人萧穆^①,今之学人如汪绍楹、李慧玲、黄庆雄、王宁等皆持赞同态度^②。

二是“阮氏自发说”,代表人物是刘玉才。刘先生通过考察国家图书馆所藏《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膳清本与刻本之间的异同,得出“阮元延客校勘《十三经注疏》,应主要是受到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卢文弨只是启发者之一。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与卢文弨手校《十三经注疏》并没有直接继承关系,故今存李锐《周易注疏校勘记》原始稿本甚至没有直接引用卢文弨本人的校勘意见,是严杰补校时方与浦镗的校勘成果一起增加进去。”^③唐田恬亦云:“《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纂,是阮元在不断积累与充分准备后,自发组织江浙学人进行的。”^④“以《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全部依据卢文弨校本而作,则未免失之武断。卢文弨只是《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参考的众多清代学人中的重要一家,但并非最重要的一家。”^⑤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他们依据的材料或为卢文弨《群书拾补》中的诸经注疏校正,或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保存的卢文弨校本信息,或为《抱经堂文集》《拜经堂文集》《敬孚类稿》等清人文集与题跋,都不是卢文弨《十三经注疏》校本原书(卢氏校本或已不存),故所得结论难以完全令人信服。

今湖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张尔耆过录的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可谓弥足珍贵,或可作为深入了解卢氏校勘《十三经注疏》具体情况的样本。今以该校本为中心,从文本内容上考察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与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之间的关系,进而窥见《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编纂过程,希望对

①萧穆:《敬孚类稿》卷八《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影印清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5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②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第25页。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第188页。黄庆雄:《阮元辑书刻书考》,《古典文献研究辑刊》第4编,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71页。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页。

③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第4页。

④唐田恬:《阮元〈周礼注疏校勘记〉探析》,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7页。

⑤唐田恬:《〈周礼注疏校勘记〉平议》,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16页。

相关问题之认识有所裨益。

一、《周易注疏校勘记》引卢文弨校勘成果的来源

《周易注疏校勘记》(以下简称“《周易校勘记》”)书前“引据各本目录”中没有明确提及卢文弨的校勘著作,仅在“影宋钞本”下曰“据徐姚卢文弨传校明钱孙保求赤校本,今称钱本”^①,然文中却多次引用卢氏的校勘成果,惜没有一一标明出处。

针对这部分校记的来源,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②:一是认为引自卢氏《群书拾补·周易注疏校正》(以下简称“《校正》”);二是主张源自卢氏《周易注疏》校本(以下简称“卢校本”);三是二书兼采说。笔者曾撰作《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引据卢文弨校勘成果来源考述》一文,通过比勘卢校本、《校正》与《周易校勘记》内容异同,所得有二:其一,《校正》虽是卢氏从校本中择取的部分校勘成果,但并非一字不变地迳直钞自校本,而是经过一定程度地再整理,或增补新的条目,或完善旧有条目,使得《校正》收录的校语详实有据,言有所本。其二,《周易校勘记》参引的卢氏校勘成果主要来自卢校本,而非《校正》^③。

故本文排除《校正》,将重点放在卢校本与《周易校勘记》上,进一步探究二书关系。详勘可知,《周易校勘记》中除了明确引用卢氏之说的内容外,还存在大量与卢校本重合的条目。以《周易校勘记》卷一、卷四、卷五、卷八、卷九为例,将统计结果列于表1:

表 1

	卷一	卷四	卷五	卷八	卷九	合计
《周易校勘记》条目数量	277	218	228	157	118	998
卢校本条目数量	227	195	201	166	106	895
二书重合条目数量	186	139	125	104	71	625
《周易校勘记》独有的条目数量	91	79	103	53	47	373
卢校本独有的条目数量	41	56	76	62	35	270

①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影印清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第290页。

②以下三种意见分别见于井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所据“卢文弨校本”考》, https://www.sohu.com/a/220760167_755268;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文献》2018年第1期,第55页;王宁:《卢文弨〈周易注疏〉校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3页。

③樊宁:《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引据卢文弨校勘成果来源考述》,《周易研究》2019年第3期,第78-87页。

据表1,此五卷《周易校勘记》与卢校本重合的条目超过600条,占《周易校勘记》条目总数的62.6%,这意味着《周易校勘记》有超过一半的条目存在参考卢校本的可能。可见《周易校勘记》对卢校本的使用远不止征引几条校记那么简单,这些重合的条目,便是讨论二书承袭关系的直接材料。

二、《周易注疏校勘记》承袭《周易注疏》卢文弨校本的证明

(一)罗列版本异文

《周易校勘记》的主要内容是罗列不同版本的异文,而卢校本的大部分校记亦是如此。欲比对这部分内容,首先要明晰二书使用的版本异同。《周易校勘记》书前《引据各本目录》所列版本有:唐石经,清武英殿翻刻岳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下简称“《考文》”)中的古本、足利本和宋刻八行本,钱求赤钞本^①,十行本(即阮刻底本,实为元刻明修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本,明万历北监本,明毛氏汲古阁本^②。而卢校本卷前题识云:

明天启时有钱孙保求赤号匪庵影宋钞本,与毛氏本科段大不相同,今武英殿本略近之,而亦未全是也。今取以校正,称钱本,其殿本称新本。卢文弨识。

据上,卢氏是以毛本为底本,参校钱求赤钞本(以下简称“钱本”)和清武英殿刻本(以下简称“殿本”)。此外,查阅书中校语可知,卢氏还征引了山井鼎《考文》的古本、足利本和宋刻八行本(以下简称“宋本”)③。由此知,卢校本和《周易校勘记》共同采用的版本有5个:钱本,《考文》中的古本、足利本、宋本和殿本。以下举例分析二书对这些版本的利用与承袭情况。

1. 钱求赤钞本

明末清初藏书家钱求赤《周易注疏》钞本曾参校宋刻诸本,保存了重要的异文信息。卢文弨曾得见钱本,以“影宋钞本”赞之,成为他批校《周易注

①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指出:“李锐所据钱遵王本、钱求赤本,实为一本。”(第31页)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进一步补充云:“《周易注疏校勘记》所引单疏本‘宋本’(钱遵王校本)和注疏合刻本‘影宋钞本’(钱本)确为一本,与钱曾无涉,实乃钱求赤所校。”(第54页)

②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第289-290页。

③此外,卢氏校本中还出现少量的神庙本、万本(即明万历北监本)、正嘉本(即元刻明正德、嘉靖修补本)、卢本异文。

疏》的主要参校本^①。《周易校勘记》亦大量引用钱本异文。而据汪绍楹、顾永新等学者考察,阮元等人并未见过钱本原书,实乃转引自卢氏传校本,“且已不辨其出自钱曾抑或钱求赤”^②,此论甚确。然鉴于以前的研究并不是据卢校本直接得来,故仍可作进一步补充考述。以《周易校勘记》卷一、卷四、卷五、卷八、卷九为例,统计二书参引“钱本”的情况,见表2:

表 2

	卷一	卷四	卷五	卷八	卷九	合计
《周易校勘记》引钱本条目数量	104	55	46	34	21	260
卢校本引钱本条目数量	127	71	79	51	31	363
二书重合条目数量	104	55	46	34	21	260

由表2可直观看出这五卷《周易校勘记》所引的钱本异文皆见于卢校本,进一步分析这些重合的校记,发现《周易校勘记》对钱本的引用与卢校本存在明显的承袭关系;二书都以罗列钱本异文为主,有按断语的条目较少,且卢校本9条有按断语的条目皆见于《周易校勘记》。如卢校本卷四《晋卦》疏文“不成一伎王”云:

宋、钱“术”。文弼案,《颜氏家训》作“不成伎术”,知“王”字误也。

(卷4/20b/5)^③

《周易校勘记》此条作:

闽、监、毛本同。钱本、宋本“王”作“术”。按,卢文弼云:“《颜氏家训》作‘不成技术’,知‘王’字误也。”(第318页)^④

又如卢校本卷八《系辞下》疏文“故言其辞游也”云:

钱“浮游”,宋同。“言”字疑衍(卷8/34a/1)

《周易校勘记》此条作:

闽、监、毛本同。钱本、宋本“游”上有“浮”字。卢文弼云:“‘言’字疑衍。”(第343页)

①据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考察:“钱本并非影宋钞本,而是以宋刻宋元递修八行本和明万历北监本为主体,兼及单疏本和经注本,汇校各本异文重构而成的、新的校定本。”(第52页)

②顾永新:《钱求赤钞本〈周易注疏〉考实》,第53页。

③卢校本的底本为毛本《周易兼义》。为行文方便,文中凡引用卢校本者,皆以“卷/叶面/行”表示校语位置,如“卷4/20b/5”表示毛本卷四叶二十左面第五行。

④本文所引阮元《周易注疏校勘记》,皆据影印清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80册),随文标出页码。

另据刘玉才考察,《周易校勘记》初稿由李锐执笔,止校文字异同,甚少论断,其中按断语、所引李鼎祚《周易集解》异文以及卢文弨、浦镗等人的校勘成果,为严杰后来增补^①。据此,《周易校勘记》这9条按断语当是严杰补入。

综上,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得知《周易校勘记》的按语来源,明晰《周易校勘记》对卢校本的承袭关系。

2. 古本、足利本、宋刻八行本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卢文弨于友人鲍廷博处获见日本学者山井鼎《考文》一书,感叹“海外小邦,犹有能读书者,颇得吾中国旧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复三四本,合以参校,其议论亦有可采。然犹憾其于古本、宋本之讹误者,不能尽加别择,因始发愤为之删订,先自《周易》始,亦既有成编矣”^②。由上,卢氏虽赞叹《考文》,但也指出其不足之处,进而萌生删订想法,与自己的校勘成果合并为一书,故卢校本中引用《考文》古本、足利本、宋本异文的校记数量颇多。《周易校勘记》也大量征引《考文》古本、足利本、宋本异文。对勘二书重合条目,亦可看出《周易校勘记》十分明显的承袭痕迹。统计见表3:

表 3

	卷一	卷四	卷五	卷八	卷九	合计
《周易校勘记》引古本条目数量	67	94	77	63	47	348
卢校本引古本条目数量	34	78	52	49	41	254
二书重合条目数量	32	77	52	46	39	246
《周易校勘记》引足利本条目数量	26	30	27	22	16	121
卢校本引足利本条目数量	26	28	27	20	15	116
二书重合条目数量	26	28	26	20	15	115
《周易校勘记》引宋本条目数量	123	75	85	57	43	383
卢校本引宋本条目数量	125	74	80	57	44	380
二书重合条目数量	121	73	80	55	43	372

此五卷《周易校勘记》与卢校本重合的条目分别有246、115、372条,约占《周易校勘记》条目总数的71%、95%、97%。如此高的重合度,反映出二书都颇为重视《考文》,吸收了其大部分校勘成果。条目重合仍旧是一种较为笼统的表面现象,不能直接说明二书有承袭关系。然进一步考察,仍可发现《周

①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第8页。
②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七《周易注疏辑正题辞》,中华书局,1990年,第85-86页。

《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蛛丝马迹,尤其是卢校本所引《考文》本身有误,《周易校勘记》未翻检原书,径直承袭其错误。此类例子是证实《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最有力证据,试举二例。

《周易校勘记》卷一《乾卦》疏文“欲进于王位,犹豫迟疑”条云:

闽、监、毛本同,下同,宋本“迟”作“持”,与注合。(第292页)

按,此例出自毛本卷一《乾卦》“九四或跃在渊”疏文,这段疏文中“迟疑”二字共出现四次,上引为第1处,其他分别为:“云无咎者,以其迟疑进退”“居非所安,迟疑犹豫”“故迟疑犹豫,未敢决断”。对照阮刻本《周易兼义》正文,仅第3处作“持疑”,其余皆作“迟疑”,其中第1处原文旁有圈识^①,即《周易校勘记》出校之处。

卢校本将毛本4处“迟疑”皆改作“持疑”^②,并在第1处原文下云“宋‘持’”。而《考文》之《周易注疏》卷一,仅有“居非所安,迟疑犹豫”条,原文作“迟疑犹豫,七叶右三行^③,‘迟’作‘持’”^④。再核《考文》所据的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刻八行本《周易注疏》此段疏文,仅第3处作“持疑”,其余皆作“迟疑”^⑤,与《考文》所述一致。可知,卢氏错误地引录第1处“迟疑”《考文》引宋本作“持疑”。阮校记亦有此误,极有可能没有查阅《考文》原书,承袭卢氏的误判,此一明证。

《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情谓情实”条云:

“闽、监、毛本同。钱本、宋本‘情实’作‘实情’。”(第343页)

按,此例出自毛本卷八《系辞下》疏文^⑥,原文作“正义曰:情谓实情,伪谓虚伪,虚实相感。若以情实相感,则利生”,阮刻本同,其中“情谓实情”旁有圈识,即《周易校勘记》出校之处。

卢校本将“情谓实情”之“实情”互乙,云“钱、宋乙”。而《考文》之《周易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周易兼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9-10页。

②按,《十三经注疏正字》于第1处出校曰:“疏犹豫迟疑:‘迟疑’当依注作‘持疑’,后并同。”(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5页)“后并同”,可知浦镗认为后面三处亦当作“持疑”。故卢氏将毛本4处“迟疑”皆改作“持疑”,也有可能是采纳《正字》之说。

③此处是《考文》说明毛本位置。下同。

④〔日〕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⑤《周易注疏》,影印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刻八行本,《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4辑第1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⑥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一册《周易兼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176页。

注疏》卷八,仅有一句疏文“若以情实相感,三十三叶左五行,‘情实’作‘实情’”^①。足利学校藏宋八行本《周易注疏》疏文,作“情谓实情,伪谓虚伪,虚实相感。若以实情相感,则利生”^②,与《考文》所述一致。由此可知,卢氏将《考文》出校的“若以情实相感”之“情实”误看成前一句“情谓实情”之“实情”。《周易校勘记》没有查看《考文》原书,径直承袭卢氏之误,此又一明证。

综上,只有比勘卢校本,才能弄清《周易校勘记》致误的真正缘由,并可知《周易校勘记》对卢校本有十分明显的承袭痕迹。

3. 武英殿刻本

卢校本参引相当数量的清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异文(卢校本称“新本”),然《周易校勘记》中“殿本”却未出现一例。阮元等人因何不使用殿本,其间缘由值得深思^③。然对勘卢校本,可知《周易校勘记》并非绝对不涉及殿本,其征引殿本时会在表述上作一些处理,并不直言“殿本”或“官本”^④。

如《周易校勘记》卷七《系辞上》疏文“而载易之爻辞也”条:

卢文弨校本“而”作“两”。(第337页)

卢校本作:

“而”,新“两”。(卷7/27a/1)

按,此条校记卢校本引殿本作“两”,《周易校勘记》承袭,但不云殿本,改成“卢文弨校本”。

又如《周易校勘记》卷四《晋卦》疏文“有庆者委任得人”条:

卢文弨云:“疏读‘失得勿恤往’为句。故此上无‘往’字。”(第318页)

按,初读此条校记,不知卢氏所云。对照卢校本,此例出自毛本卷四《晋卦》“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疏文,原文作“正义曰:有庆者,委任得人……”,卢校本于“正义曰”下增“往”字,云“往,新添”,又在天头批云“案,疏读‘失得勿恤往’为句,故此上无‘往’字”。据此,卢氏的校语是针对殿本而言,殿本认为“往”字属下读,而卢氏认为“往”字属上读,否定殿本增“往”字。《周易校勘记》仅转引卢氏校语,却删去所涉殿本信息,遂致不知所云。

①〔日〕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第50页。

②《周易注疏》,《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4辑第1册,第195页。

③关于此问题,可参考邱亮、唐生周:《汉宋分帙与〈十三经注疏〉两种校考记的形成——兼谈阮刻本对殿本避而不谈的原因》,《浙江学刊》2016年第6期,第74-81页。

④井超亦发现阮校记存在暗引殿本的情况,对原因有一定分析,详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暗引殿本琐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第2期,第94-97页。

(二)引据前人著作

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不仅汇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经书版本,进行版本对校,罗列各本异同,还广泛吸收毛居正、王应麟、陆粲、惠栋、浦镗、卢文弨、陈树华、段玉裁等多位前辈或当时学者的校勘成果,可谓汇集众家,博采群言。具体到《周易校勘记》而言,主要引用李鼎祚、毛居正、浦镗、惠栋、钱大昕、孙志祖等人的著作,其中征引数量最多的是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以下简称“《正字》”)和李鼎祚《周易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卢校本《周易注疏》亦主要参引《正字》与《集解》。对勘二书此部分校语,亦可探析其间的承袭关系。

1. 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

卢氏获见《考文》之后,又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翁方纲处得见浦镗《正字》。鉴于《考文》与《正字》互有优劣,卢氏“兼取所长,略其所短”^①,重为整顿,并参以己见,开创了重要且可行的校勘《十三经注疏》的方法与路径。此举对阮元等人深有启发,《周易校勘记》亦大量采引浦镗《正字》。相关统计如表4所示:

表 4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合计
《周易校勘记》引《正字》条目数量	5	1	4	3	0	0	2	8	0	23
卢校本引《正字》条目数量	20	19	21	11	19	13	10	29	13	155
二书重合条目数量	4	1	4	3	0	0	2	8	0	22

核校结果显示,《周易校勘记》所引《正字》除卷一“阳三阴四”条^②外,其余皆见于卢校本。虽然此条或可表明《周易校勘记》曾自行翻阅《正字》,但是其余22条重合条目仍能透漏出二书之间的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某些条目,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明晰《周易校勘记》的致误缘由。

如《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皆习包犧氏之号也”条:

浦镗云:“‘习’当作‘袭’。”(第340页)

按,此条出自毛本卷八《系辞下》疏文,原文作“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黄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习包羲氏之号也”。卢氏对此

①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七《周易注疏辑正题辞》,第85页。

②《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阳三阴四”条云:“闽、毛本同。监本‘三’字中画不全。浦镗云‘三误二’,非。”(第291页)卢校本无此条。

句进行了5处修改:“大庭氏”下增“王有天下次有”六字、“柏黄”改作“柏皇”、“尊卢氏”下增“祝融氏”、“皞英”改作“昊英”、“皆习”改作“皆袭”,并于页脚下写一“沈(即沈庭芳)”字,表明以上改订都依据《正字》^①。然《正字》中仅见前4处校改,不见“皆习”改作“皆袭”条^②。可见,《周易校勘记》并没有逐一翻阅《正字》,而是从卢校本中转引,并把卢氏自己的校语误当作《正字》原文,留下明显的承袭痕迹。

此外,《周易校勘记》明确标明引用卢氏按断语的校记有39条,有11条内容与浦镗《正字》一致。如《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待隼可射之动而射之”条云:

卢文弨云:“上‘之’字下当有‘时’字”。(第341页)

卢校本于第一个“之”下加“时”字(卷8/15a/4)。《正字》此条云:

上“射之”下当脱“时”字。^③

又如《周易校勘记》卷二《谦卦》疏文“卑谦而不可踰越”条作:

《集解》作“卑者有谦而不逾越”。卢文弨云:“《论语疏》所引正同。”(第305页)

卢校本于“卑”下增“者有”二字,并云:

二字见《论语疏》并《集解》(卷2/50a/2)

《正字》此条云:

脱“者有”二字,从《论语疏》校。^④

这类校记实系卢氏引用《正字》的校勘意见,但未标注出处。《周易校勘记》却直言“卢文弨云”,误把浦镗成果当作卢氏之功,也显然是径直承袭卢校本而来,未翻阅《正字》原书的表现。

2. 李鼎祚《周易集解》

卢校本还多次引用李鼎祚《集解》,《周易校勘记》亦有很多《集解》引文。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二书所引《集解》异文多有重合,统计见表5:

①按照卢校本的全书体例,凡一段中有数处文字依据同一种书修改者,基本是在此段文字下方统一标注出处,故此处标注“沈”,表明以上5处改订都依据《正字》。按,《十三经注疏正字》目前只有一个版本,即《四库全书》本,题作“清沈廷芳撰”,然此书实际的作者是浦镗(说详李慧玲:《阮刻〈毛诗注疏(附校勘记)〉研究》,第175-185页)。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引该书时标注为“沈”,而在《周易注疏辑正题辞》中直言作者是浦镗(《抱经堂文集》卷七,第85页),很可能卢氏初得此书时尚不知作者是浦镗。

②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29页。

③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30页。

④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2册,第12页。

表 5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合计
《周易校勘记》引《集解》条目数量	6	17	12	4	4	3	3	8	4	60
卢校本引《集解》条目数量	3	16	14	3	4	6	5	17	14	82
二书重合条目数量	3	15	12	3	3	3	3	8	3	53

由表 5 可知,《周易校勘记》仅新增了 7 条《集解》引文,其余 53 条皆与卢校本所引重合,其中亦可体现出二书的承袭关系。

首先,卢校本所引《集解》多从《正字》转引,而《周易校勘记》所引《集解》又多从卢校本转引。如卢校本卷二《谦卦》疏文“是君子之所终也,言君子能终其谦之善事,又获谦之终福,故云君子之终也”,卢校本将“所”字删去,“事”作“而”,删“终福”之“终”,“君子之终”作“君子有终”,云:

沈依李。(卷 2/50a/2)

《正字》卷一此条云:

“所”衍字,“而”误“事”,“福”上衍“终”字,从《集解》校。^①

《周易校勘记》云:

《集解》无“所”字,“事”作“而”,无“福”上“终”字,“之”作“有”。

(第 305 页)

其次,存在《周易校勘记》未翻阅《集解》原书,从卢校本转引时不慎致误的情况。如《周易校勘记》卷九《杂卦》注文“谦者不自重大”条云:

《集解》作“不自任也”。(第 347 页)

按,此句为毛本卷九《杂卦》“谦轻而豫怠也”注文。然李鼎祚《集解》卷十七“谦轻而豫怠也”下作“谦位三,贱,故轻。豫荐乐祖考,故怡。怡或言怠也”^②。而《集解》全书,并没有“不自任也”句。卢校本于注文“重大”旁作“任也”二字,并加一“卢”字;似乎此处应是卢文弨的修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字》此条作“重大,卢本作‘任也’”^③。据王晓静考察,浦镗《正字》所引“卢本”乃是明人卢复辑《三经晋注》本《周易》^④。故卢校本标注之“卢”非指卢文弨本人,而是明人卢复,此为卢文弨从《正字》转引。《周易校勘记》显

①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92 册,第 12 页。

②李鼎祚:《周易集解》,影印明嘉靖三十六年聚乐堂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 1 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第 311 页。

③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92 册,第 34 页。

④王晓静:《清代浦镗〈周易注疏正字〉卢本发覆》,《天一阁文丛》第 16 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66-74 页。

然没有查阅《正字》与《集解》，仅依据卢校本，想当然地认为卢校本参考《集解》而来，承袭痕迹甚为明晰。

(三) 引用卢文弨按断语

除上文外，《周易校勘记》还引用了不少卢氏的按断语，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周易校勘记》明确标为引自卢氏的按断语，共计 39 条，皆见于卢校本。然《周易校勘记》有若干条校记征引卢氏按语并不完整，以致表述不清或遗漏材料来源。如《周易校勘记》卷一《乾卦》疏文“百姓既未离祸患”条作：

卢文弨云：“‘未’字衍文。”（第 292 页）

按，此例出自《乾卦》疏文“百姓既未离祸患，须当拯救”。依据《周易校勘记》卢氏之说，无“未”字，句意殊不通，百姓既已离祸患，何须拯救？不免怀疑卢说不确。而卢校本作：

“未”疑衍。离，罹也。（卷 1/7b/4）

如此则文义明晰（唯不知卢氏是何依据）。《周易校勘记》截取前文而舍弃后语，以致文义乖舛。

又如《周易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生颡项于弱水”条作：

卢文弨云：“当作‘若水’。”（第 340 页）

而卢校本作：

当作“若水”，《宋·符瑞志》。（卷 8/7a/7）

按，卢校本认为“弱水”当作“若水”，并指出依据为《宋书·符瑞志》，核以《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上》，有云“生颡项于若水”^①。可见《周易校勘记》遗漏材料来源。

第二是《周易校勘记》没有标明出处，暗引卢氏按断语。如《周易校勘记》卷二《泰卦》疏文“扬州其贡宜稻麦，雍州其贡宜黍稷”条作：

按，二“贡”字，《周礼》并作“谷”（第 303 页）

按，此条出自毛本卷二《泰卦》疏文：“《大司徒》云‘其动物、植物’，及《职方》云‘扬州其贡宜稻麦，雍州其贡宜黍稷’。”卢校本于“《大司徒》”前增“《周礼》”二字，将两个“贡”改成“谷”字，并云：

宋亦脱，误。（卷 2/34a/8）

可知此条《周易校勘记》按断语来自卢校本，然未标明。

以上通过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著作、征引卢氏按断语三个方面的探讨，清晰地看到《周易校勘记》存在大量承袭卢校本的情况，特别是上文所举多条例证，只有对勘卢校本才能明晰《周易校勘记》因何致误，这些皆是证明《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有力证据。

^①沈约：《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上》，中华书局，1974 年，第 761 页。

三、《周易注疏校勘记》的增补与推进

《周易校勘记》虽然承袭不少卢校本的内容,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周易校勘记》价值不大。据上文统计(表1),《周易校勘记》五卷独有的校记达到373条,约占总数的37.4%。与卢校本相比,《周易校勘记》增补大量新的校记,推进了《周易》的校勘工作。总体而言,新增校记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①:

一是补入新的版本异文。相较于卢校本,《周易校勘记》增加多种新的版本,包括唐石经、清武英殿翻刻岳本、元刻明修十行本、闽本、监本,而元刻明修十行本正是《周易校勘记》的底本。随着参校版本的增多,《周易校勘记》的条目数量也大为增加,其中三分之二左右都是新增的版本异文校记,成为增补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二是增加参引著作的数量。除《正字》和《集解》外,《周易校勘记》还吸收了许多其他学者的著作。统计如下:吕祖谦1次,出自《古易音训》^②;惠栋1次,引自《周易古义》^③;孙志祖10次,皆为孙同元增入^④;钱大昕2次,引自《十驾斋养新录》^⑤;张惠言1次,源自《周易虞氏义》^⑥;王念孙1次,见于《经

① 鉴于张学谦《〈周易注疏校勘记〉编纂考述》已经对《周易注疏校勘记》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探研(《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7-330页),故笔者仅指出《周易注疏校勘记》新增补的四个方面内容,不再举例详细赘述。

② 吕祖谦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三《复卦》经文“频复”条(第311页);出自《古易音训》卷上《复卦》,详见黄灵庚主编:《吕祖谦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③ 惠栋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蒙卦》经文“童蒙求我”条(第297页);出自《周易古义》卷一,详见惠栋:《九经古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第363页。

④ 据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考察,《周易注疏校勘记》所引孙志祖校语皆为孙同元增入(第8页)。然此10条校语不见于孙志祖《读书腴录》等著作,另据《礼记注疏校勘记》卷前《引据各本目录》有“孙志祖校本”,《中国古籍总目》著录重庆图书馆藏有一部孙志祖校本《春秋左传注疏》,故笔者推测《周易注疏校勘记》所引孙志祖校语,很可能出自孙志祖校本《周易注疏》。

⑤ 钱大昕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经文“力小而任重”条(第341页)、卷九《序卦》经文“必反于家”条(第346页);皆出自《十驾斋养新录》卷一,详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增订本)》第7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⑥ 张惠言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七《系辞上》经文“故再扞而后挂”条(第337页);出自《周易虞氏义》卷七,详见林忠军主编,陈京伟导读:《周易虞氏义》,华龄出版社,2019年,第233页。

义述闻》^①;严杰1次,当是校补时增入^②。可见《周易校勘记》比较重视同时代学者的成果,然多数著作仅偶及一见,新增条目数量仍比较少,缺乏丰富性和广泛性。

三是使用叶林宗影宋钞本《周易释文》进行校勘。虽然《周易校勘记》所据不是叶钞原本^③,但大规模地将《周易释文》引入校记,加以考辨,亦有助于推进《周易》的校勘工作。

四是新增诸多按断语。《周易校勘记》新增139条考辨按断语,是增补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这些按断语主要有三个突出特点:灵活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等多种校勘方法进行判定;注意区分古今字、正俗字与通假字,并讨论不同时代的不同用字特点;运用声音相近、反切上下字、古韵分部(采用段玉裁十七部说)等音韵学知识进行按断。

以上对《周易校勘记》的新增校记略作分析,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获,可见《周易校勘记》并不是完全承袭卢校本,又有很多增补与推进工作。当然,对此事的确切认知,同样有赖于卢校本的重现与全面对校。

四、结语

清嘉庆五年(1800),阮元重整昔日修纂《经籍纂诂》的房屋,设立“诂经精舍”,次年正月开十三经局,延揽学者校勘《十三经注疏》。此项工程汇集了当时能见到的各种经书版本,不仅进行版本对校,罗列各本异文;还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尽可能地搜集相关异文;遇到难以决断之处,更参考诸多前人著作,进行取舍。至嘉庆九年,李锐等人完成了2333条《周易校勘记》的校

①王念孙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一《蒙卦》经文“童蒙求我”条(第297页);出自《经义述闻》卷一,详见朱维铮主编,钱文忠、虞万里等整理:《经义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②严杰校语位于《周易注疏校勘记》卷八《系辞下》疏文“待隼可射之动而射之”条(第341页)。

③顾广圻曾指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据的《经典释文》是一部何元锡临录的段玉裁据叶钞本的传校本,说见《跋经典释文三十卷校本》云:“予尝言近日此书有三厄,卢抱经新刻本多误改,一厄也;段先生借叶钞重校,而其役属诸庸妄人之手,未得其真本,即此二也;阮中丞办《考证》,差一字不识之某人(指何元锡)临段本为据,又增出无数错误,三也。”(《顾千里集》卷十七,中华书局,2007年,第268页)袁媛《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证〉到阮书》亦认为:“阮元等人所据叶钞本并非原本,而为辗转过录之本,与原本存在差异。”(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70-373页)

勘、增补、覆核工作^①。相较于巨大的工作量,三四年的时间毕工,也算迅速。而本文考证,《周易校勘记》在罗列版本异文、引述前人成果等方面,存在因袭《周易注疏》卢文弨校本的痕迹。尤其是上举诸例,只有对勘过卢校本才能明白《周易校勘记》的校语(按语)由来以及致误缘由,此皆是证明《周易校勘记》承袭卢校本的有力证据。对卢文弨这样的校勘大家已有校勘成果的充分利用,应该是《周易校勘记》乃至《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编纂过程中的常态^②。

同样,以卢校本《周易注疏》为参照,也能更为清楚的了解《周易校勘记》的创新之处。从参引版本上看,《周易校勘记》增加6种新的版本异文,仅这一项工作所得的校记数量就非常多,成为对卢校本最重要的增补工作;从引用著作上看,除卢校本征引的《正字》《考文》《集解》外,《周易校勘记》多参考如惠栋、钱大昕、孙志祖、张惠言等诸家;从校勘深度上看,《周易校勘记》增补了考辨与按断语,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由此可见,《周易校勘记》的编纂实践在前人基础上也有新的推进与发展,并由此形成纵向脉络,推动清代校勘学与经学向前发展。

以上讨论希望能对《周易校勘记》的成书过程形成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周易校勘记》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与批判,从而推陈出新,取得更多创获,终成不朽之作。同样的,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在重新发掘同时代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全面的文本校勘为依据,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认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真正价值,给出合理的学术定位与评价,这对于清代经学史与学术史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樊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清代经学史。

①国家图书馆藏有《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稿本和誊清本。据张学谦《〈周易注疏校勘记〉编纂考述》考察:“稿本第二册卷末有朱笔题署‘甲子仲春三日严杰校补’,誊清本各册封底有甲子(嘉庆九年,1804)十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孙同元题记,《周易注疏校勘记》定稿当在此后不久。”(《版本目录学研究》第7辑,第308页)

②如据袁媛考察,《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在很大程度上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而来(《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到阮书》,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53-380页)。